



论李忆著《春秋流转》女性形象的建构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Lee Yoke Kim's
“The Circula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杨欣宜

CARMEN JONG SHIN YI

20ALB04543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3



论李忆著《春秋流转》女性形象的建构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Lee Yoke Kim's
“The Circula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杨欣宜

CARMEN JONG SHIN YI

20ALB04543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3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主题和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背景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
第四节 前人研究综述	7
第五节 研究目的	11
第二章 传统女性：父权主义下的抗逆、叛变和扭曲	13
第一节 孙桂娘：伦理意识的回归	14
第二节 红莲：伦理的叛变	16
第三节 小结	19
第三章 女性形象的建构：现代女性和母女形象	21
第一节 赵静娴：现代女性	21

第二节 母女：女性经验的投射	23
第三节 小结	27
第四章 结语	28
第一节 研究发现	28
第二节 研究局限和建议	31
引用书目	32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杨欣宜 CARMEN JONG SHIN YI

学号：20ALB04543

日期：2023 年 12 月 1 日

论文题目：论李忆著《春秋流转》女性形象的建构

学生姓名：杨欣宜

指导老师：曾维龙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李忆著通过描写两性情感纠葛述说女性和男性的困境，反映两性在社会上被赋予的期望和角色，并鼓励两性打破自身的枷锁。在父权社会下被父权体制所塑造出的女性和男性，长期处于不平等的两性伦理环境，导致无法建立起健康的身心灵和健全的人格。女性对自身主体建构的不完整，因而出现在欲望和伦理规范之间冲突的局面。李忆著刻画的女性形象拥有多面性，展现在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徘徊的女性，倾听她们的困难。在女性关系中，尤其是母女情感的亲密关系，易于建立起女性认同共同面对困境，母亲是女儿在自我认知和主体意识建构过程上的主要引导者。此论文对《春秋流转》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探讨角色的心理，采取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解读文本角色的婚外情、两性角色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和伦理意识，对文本情节和两性关系进行分析和探索。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女性形象、《春秋流转》、李忆著

致谢

大学三年转瞬即逝，感谢一路上帮助我、鼓励我和陪伴我的家人和朋友。因为有家人这一坚强的后盾，我才能没有顾虑在大学顺利完成课业，也是家人给予我的关心让我能够勇敢面对困难。在我情绪低落、感到压力而怀疑自己时，我的朋友们都在第一时间安慰我，陪我外出散心，疏导我的情绪，在课业上也少不了朋友的帮助。感谢过去和现在的自己，祝我在未来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探索自己，前程似锦，身体健康。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主题和对象

李忆著是一位擅于写女性的马华作家，她通过描写两性在婚姻中的遭遇、抉择和两性纠葛表达自己对两性的关怀。她于 1971 年开始创作，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目前已出版约 15 本著作。李忆著的创作可归类为散文：《去日苦多》（1981 年）、《漫不经心》（1983 年）、《城市人》（1986 年）、《岁月风流》（1993 年）、《大地红尘》（1997 年）和《年华有声》（2005 年）；小说有短篇小说《女人》（1982 年）、中篇小说《痴男怨女》（1990 年）、小说集《李忆著文集》（1995 年）、长篇小说《春秋流转》（1996 年）、长篇小说《镜花三段》（1999 年）、小说集《梦海之滩》（1999 年）和长篇小说《遗梦之北》（2012 年）。¹在马华女作家中，李忆著的作品从婚姻探寻两性关系，其中涵盖对女性自身的反思、女性价值的探讨以及调和两性关系的矛盾。李忆著擅于描写男女的情感与心理，她笔下的女性敢爱敢恨、敢于为了自身的欲望与追求打破传统的囚笼、充满傲气与追求自我，同时却摆脱不了母亲身份的桎梏，因不守妇道而陷入悲剧的命运。李忆著透过对已婚和离婚妇女的书写，表现出女性的自我意识。

¹戴小华，《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6），页 204。

《春秋流转》是李忆著的长篇小说，以赵、颜两家的情感纠葛贯穿整篇文本，两家的成员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婚外情中，婚外情使两家人与彼此紧密相连。两性的宿命在交替流转中形成闭环，婚外情如同诅咒成为两代人的困境，缠绕在两个家庭之间，从父母延续至孩子一代。整个文本弥漫着一种阴郁和悲观的氛围，深刻展现了人性的扭曲和家庭的破裂。李忆著主要通过女性叙事视角对男女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进行塑造，男性的叙事地位居于次之。她刻画的女性形象各异，女性角色在她的笔下呈现着不同的抉择，小说展示她对两性命运的思考和自省，以及两性关系平等的认知。李忆著作为马华女作家，所具有的女性经验使得她在书写文本时能够与女性角色共鸣，真实地反映出女性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涉及自我认同与家庭责任。除此之外，小说也蕴含了伦理的思想，以“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诲功能。”²的角度切入对两性角色的思考，分析社会对男女的性别期望与传统定义，李反映的伦理思想和家庭伦理规范。

李忆著在创作中没有采取激进的女权主义，她主张的是两性平等，而不是与男性为敌。在小说中，她以女性为叙事中心展开论述，呈现女性在婚姻中的故事，以怜悯的态度对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进行描绘，对两性不采取过多的道德批判，从人物形象体现女性意识。因此，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切入，分析《春秋流转》违背道德的伦理环境和困境、女性伦理身份的迷失和重构、男性与女性的伦理选择，并关注男女两性关系和谐的建立。透过对《春秋流转》中的故事展开对书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进行刻画，如何影响人物的伦理冲突和角色发展。李忆著在作品中并没有站在审判的视角上去批判书中人物，书中无论

²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 4。

是男性或女性的出轨，李都没有一味地谴责任何一方，而是思考两性在婚姻应该遵守的伦理。在《春秋流转》中，李与其他女性书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她坚持寻求两性关系从隔阂、矛盾激化、走向和解，试图修复两性关系中的裂痕，达到两性平等。

从众多马华女性书作家中以李忆著的长篇小说《春秋流转》作为研究对象，是在阅读小说时被叙事手法所吸引，作者花了大篇幅细致描写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借助第三方物体的介入衬托出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李忆着重展示女性在传统和现代思想下的性格转变和冲突，揭示女性在社会面临的困难处境，借此反思两性关系在沟通的缺失。李忆著采用了独特的叙述视角，以实现故事情节的叙述。她在不同的章节中交替使用不同的人称，创造了多重的叙述视角，这些视角相互交融，不同人物各自表达自己的看法。《春秋流转》属于复调小说，复调小说是由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巴赫金所创设的概念，他借用“复调”来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征，认为其小说拥有“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³《春秋流转》分别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的叙事手法，以不同的叙述视角对故事情节娓娓道来。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女性，李忆著以女性的视角来探索这些主题，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情感和挣扎。作品复杂的叙述手法，特别是不同人物的交替视角，为这些作品注入了更多层次和深度，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³ 巴赫金，白春仁译，《诗学与访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 4。

李忆著的复调叙述方式使得作品中的不同人物拥有独立的声音和观点，彼此相互呼应和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叙事网络。复调叙述方式有助于深入展示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思想，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故事中发生的事件和情感发展。通过复调叙述手法，她以不同人物的视角，呈现出复杂的情感和命运交织，引导读者在故事中发现共鸣，反思人性、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层面。李忆著采用的复调叙述手法在马华人女性书写中相对独特，它为作品带来了多元的声音，同时也为马华女性书写领域增添了新的维度。

第二节 研究背景

马华女性书写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由梅淑贞、李忆著、商晚筠等为代表，填补了马华女性书写的空白。⁴当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笔下的女性角色便不仅局限于家庭，而是与男性争取社会中的地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以达到两性平等。女作家们开始追求性别平等，透过创作呈现女性意识，以女性为话语中心来审视女性自身。在 80 至 90 年代这一时期，马华女性书写作品逐渐涉及婚恋、职场、身体写作等领域，以“言说女性”为书写主题，⁵如商晚筠的《巫屋》和《七色花水》、李忆著的《怨女》等，从文化、社会、性和伦理多重角度关照女性，揭示性别不平等，表达了女性的价值，对父权社会势力的解构。在她们的文本中，女性的情感经常被描写

⁴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锐文创，2012），页 31。

⁵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2015 年第 201 期，页 188。

地很细腻，经历人生的各种境遇完成女性对自我的寻找。马华女性书写呈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下所遭遇的悲剧，也向读者宣传女性可以和传统对抗。

自古以来，女性都将幸福和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一旦男性背叛家庭，女性的生活就像坍塌了一般，就连人生也要以是否结婚为圆满。在马华女性文学中可以看出作家以千千万万个女性形象大声呼喊女性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对自身与异性的思考，对父权制压迫的不满。马华文学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女性书写中涌现出两类女性形象：一类是“娜拉出走”，另一类是“躯体解放”。⁶“娜拉出走”概念可以追溯到挪威戏剧《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这一角色代表着女性解放和追求自由的象征，在文学中用于描绘女性面对不平等时，逃离现有环境寻求自由和自主的生活。在马华女性书写中，作家以“娜拉出走”的女性形象通过文本来呈现女性如何追求自我价值和自主精神，以及面对被家庭、社会和文化束缚时的行动。“躯体解放”在女性书写中表现为女性角色意识到身体权利，追求和实现身体与性别上的自主性，摆脱身体受男性的支配与评价，呼唤女性超越物化和客体化。“娜拉出走”和“躯体解放”这两类女性形象的马华女性书写作品有李忆著的《女人》、商晚筠的《卷帘》和《季妩》等。

在这个脉络下，李忆著小说中蕴含的女性意识是自觉的，激发女性从建构伦理身份中重新认识自我。她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重新审视个人追求、职业目标、经济独立和家庭责任，透露出在社会对权益的维护与追求，其中也涉及女性对男性在婚姻关系中的思考。李忆著的女性书写作品是以处理男性和女性在婚姻的情感纠葛为主，展现两性对伦理的冲突，表达她对两性群体生存现状的关怀。

⁶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页 190。

《春秋流转》大量违背道德伦理的情节，男女违背婚姻伦理背后所隐含的意义，都造成了人物在伦理的丧失。传统社会规定女性必须从事家庭劳动，而非进入社会从事劳动，在小说中也反映了女性角色对伦理的挑战。李忆著在小说中创造的伦理环境可视为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男性和女性长期处于不平等的性别伦理环境，对自身主体的建构不足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李忆著是否书写了两性违背婚姻伦理和家庭责任，以展示她对两性不平等的不满？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春秋流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切入对小说里的男性和女性的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叙事视角和叙事主题对角色进行分析，解读小说女性意识的存在，李忆著如何在语言和角色形象上反映女性意识，致力于解析李忆著角色形象建构所使用的手法。《春秋流转》中红莲母亲的死亡使红莲与母亲的母女伦理关系断裂，红莲无法建立完整的女性伦理身份，“**母女情感的特殊性对于女性成长为性别主体非常重要。**”⁷在李忆著的小说中的母亲形象，都不如传统的母亲形象那般伟大，她们会将欲望与追求放在首位。李忆著采用婚恋题材来书写，不得不涉及两性关系，因此将以小说中的两性对话和两性关系看李自身的两性观念，她试图建立的两性和谐关系。另一方面，分析“婚外情”的伦理解读，通过文学伦理学的视角解读文本和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如伦理困境和伦理环境对文本情节的伦理问题进行解

⁷付明端，《从伤痛到弥合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页91。

析，探讨李忆著如何通过文本中的伦理问题反映当前的社会概况和男性、女性面对的伦理环境。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视角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剖析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伦理关系中的伦理问题。⁸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对文本的伦理问题进行客观分析，而非简单地善恶来评价，强调通过解剖文学作品处于特定伦理环境下的伦理选择，发现其动机和变化，挖掘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倾向，对社会起到了教诲的作用。⁹

传统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期望，形成了女性需要对男性服从，展现出温柔的一面的心理，小说中的赵静娴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挑战男性在社会的地位，并非只有男性才能继承父业和在外工作，她撑起父亲经营的咖啡店，而弟弟由于没有达到性别伦理中社会对男性的角色期望，自身的无能和懦弱使他逃避责任。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研究小说中的两性行为如何影响道德发展和伦理规范，关注两性在家庭和婚姻伦理的作用，包括家庭责任、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

第四节 前人研究综述

针对李忆著作品的研究不多，大多数集中于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和主题意涵，较少集中于李忆著的个别作品进行论述。李子云的〈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作者从这本小说中两代妇女的命运殊途同

⁸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278。

⁹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99。

归，终究逃不过婚姻失败的宿命这个主旨来阐述，认为这是李忆著对大马妇女命运的反思，她指出李忆著相对商晚筠来说，对待男性的错误表现出了较温和的理解，李也没有对小说中的女性与男性划分出明显的善与恶，而是从传统的社会与文化思想去思考，婚姻失败的悲剧是由社会和男女双方共同造成的。¹⁰

一段美好的婚姻需要靠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和维持，因此和谐的两性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李忆著在其小说中所表达的两性和谐，马蜂在〈马华女作家的两性和谐小说探析〉中认为李在关注女性的悲剧时发现了问题，指出了最根源的问题，两性关系。《春秋流转》一开始便直入主题即两性关系，从隔阂走向激烈的冲突，再走向缓和到解放，传达出作者对两性和谐与平等的观念。¹¹《春秋流转》体现了她对女性自省的重视，她对女性的关怀在于她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与描写，小说中的女性在逐渐成长，从压抑的小镇逃离到外界解放自我，怀有现代意识，成为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的独立女性在马蜂的另一篇期刊论文〈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论〉中论述《春秋流转》中作者关注女性自省与倾听男性，也指出作者使用了本土元素，如乡下蔬菜、华人民间信仰与俗语等，更深刻描写了妇女形象，批评妇女经常用幸灾乐祸的语气讨论他人的事情。¹²

另一方面，在尤碧珊的〈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小说为个案〉中，她以剖析李忆著作品中的女性与男性形象，从李忆著塑造的人物看他们是如何体现出自身被传统观念所束缚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隐藏在传统下的女

¹⁰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页51。

¹¹ 马蜂，〈马华女作家的两性和谐小说探析〉，《中国女性文化》2017年第21期，页65。

¹² 马蜂，〈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6。

性现代意识，她们尝试挑战男性权威，获得能和男性争夺的机会，都说明了她们对于女性意识的追求和探索。作者从社会转型期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中的男性与女性在被传统观念影响的同时也拥有着现代意识，却无法彻底摆脱传统观念，于是在传统和现代思想中拉扯，一方面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却又被家庭和礼教束缚。¹³作者从小说中的婚姻失败深入探讨了李忆著深藏其中的两性关系，夫妻在面对另一方背叛家庭做出的抉择和谅解对方，悲剧却是由于不稳定的两性关系所造成的。

林殷醇的〈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深入分析女性角色的心理状态，作者采用俄狄浦斯的理论研究《春秋流转》的母女关系，认为孙桂娘和颜令冰母女之间建立体现了女性认同和共生关系，母亲将自身投射到女儿的身上，待女儿成长后经历了和自己一样的遭遇，便产生了认同感，给予女性教导。¹⁴作者对李忆著作品的女性角色进行划分，运用心理学理论分别从四个社会身份分析女性角色的心理状态，女性面对自己的身份时的态度和抉择。研究女性角色的心理状态，剖析小说中的文化和社会如何塑造女性角色的经历，解读她们的行为和因果关系的相互影响。

许文荣和孙彦庄所著的《马华文学十四讲》中的第十二讲〈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内容主要是对母女情节与姐妹情谊进行论述。

《春秋流转》的女儿认为背叛家庭的母亲在她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一道难以启齿和不堪的阴影，她们恐惧成为如母亲般的女性，担心母亲的命运会在自身延续，

¹³ 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小说为个案》（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论文，2012），页 22。

¹⁴ 林殷醇，《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论文，2020），页 32。

甚至对此做出绝情的分割。二位学者对《春秋流转》的令冰和母亲桂娘、令冰与红莲之间的女人关系以不同角度来分析，认为令冰的父亲是作为她们之间关系的转变的核心人物。¹⁵前者因为父亲的背叛、第三者的介入，母亲对父亲忍辱负重，期待着丈夫还能回归家庭，令冰因此对母亲产生女性认同感，解除了之前与母亲的偏见；后者因为父亲的衰老、父亲对母亲的愧疚和深情，触动了令冰内心的伦理和释放对父亲的情感，红莲与他人结婚也消灭了令冰对她“第三者”的怨恨。

在马华文学研究类型，马华女性书写的研究相对其他文学类型较少，杨启平所著的《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2012）有助于了解马华女性书写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深入探索女性主义书写这一领域。杨启平处理了马华女性书写的发展轨迹，关注马华女作家在作品中注入女性意识的初次尝试，开拓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为女性发声，关怀女性本身，冲破男权社会的压制。杨启平将马华女性书写分为两个时期：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八到九十年代和至今，列出了两个时期的女性书作家，分析她们的作品所透露的女性意识。¹⁶杨启平研究马华女性文学的生成特征，分析马华文化对女性书写的生成和影响，以及女性书写在本土的文化语境，填补了马华女性书写的空间。

刘征的〈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内容主要论述马华女性小说的写作题材以及女性人物形象。刘征认为马华文学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马华女作家开始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启发，主动“言说女性”，刻画出社会上被压迫的女性。针对马华女性小说分类了两类女性形象“娜拉出走”和“躯体解

¹⁵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228。

¹⁶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锐文创，2012），页 31。

放”，小说揭示了女性必须逃离家庭，投入社会空间才能完成人格的转变，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在父权社会，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客体，失去了躯体自主，马华女性小说通过对女性躯体的写作来解放自我，揭示身体的自主权是属于自己的，企图将女性脱离性客体的地位。通过这些小说，马华女作家完成了“言说女性”至“女性言说”的转变，结束了自身沉默，用自己的语言来言说，视为马华文学的重大突破。¹⁷

第五节 研究目的

鉴于前人研究是以李忆著作品的人物形象和角色心理状态作为研究主题，不曾以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去切入对文本的探讨，关注作品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选择。因此研究目的以分析《春秋流转》的角色之间的伦理冲突，他们的行为如何违背伦理原则和面对事件时的道德抉择。研究小说中的文化和社会如何塑造作品的情节和角色，关注李忆著如何展现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与自我意识。

有鉴于此，本论文主要探讨三个目的：

一，分析李忆著在《春秋流转》所反映的伦理问题，看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在伦理规范和自由意志下的冲突。

二，针对李忆著在作品中描述的两性关系，可以为马华文学的女性书写带来另一种视角。

¹⁷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页 190。

三，对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析。

第二章 传统女性：父权主义下的抗逆、叛变和扭曲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是作品主题和作者观点的生动表达，李忆著的小说主要聚焦于男女感情问题，从小说情节和人物言行中刻画多样性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仅是故事的配角，更是整个叙事结构中的关键元素，影响着情节的发展和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李忆著以其独特的视角传递了对女性角色性格、心理和生命体验的深刻见解，引导着读者对性别在文学中的角色与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在女性形象的呈现中，李忆著反映了女性意识逐渐增强的趋势。过去单一维度上的“好母亲”或“好妻子”形象被打破，而女性角色被赋予了更为复杂和独特的个性。这种转变倾向于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使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更为立体和真实的存在。然而，在《春秋流转》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系列几乎都拥有负面形象的女性角色，如红莲及其母亲。她们没有遵循婚姻伦理和自己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婚外情，这些女性角色成为社会规范下被压抑的个体，其人性和个性在小说中得以释放。在父权主义的束缚下，她们的欲望被宣泄和张扬，从而成为对传统规范的一种抗议。李忆著借由女性角色，述说着在社会转型期间，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章节深入研究《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形象，探讨李忆著是如何通过她的创作，以及这些女性形象如何在小说中演绎出对性别、权力和社会规范的深刻思考。

第一节 孙桂娘：伦理意识的回归

《春秋流转》的孙桂娘在青年时期就一直生活在父权思想下，缺乏对自身的关注，一直处于“失语”的局面，传统女性的社会空间长期处于“家庭内”。孙桂娘虽出生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允许自由恋爱，但依然生活在父权体制下。她所生活的是以男性价值为中心的社会，一直在男性话语的控制之下。孙桂娘是小镇上一间布店老板的女儿，从前父亲对她的管教严格，只为赚取一个大家闺秀的好名声。然而，苏春生与孙桂娘的一次谈话中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孙桂娘从来没有让一个男人如此长时间地注视过，心慌之余，又略略带着些好奇的亢奋。”¹⁸但是她已经有男朋友了，面对苏春生的追求，她感到痛苦，直到颜世昌到上海布店寻找孙桂娘，她才下定决心与他结婚。起初，面对苏春生的诱导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和隐晦的心意，后来转变为内心对伦理规范和个体欲望追求之间的挣扎，最终选择遵循伦理规范。孙桂娘的理性意志超越了自由意志，是伦理规范的挣扎和回归。在孙桂娘和颜世昌说出结婚时，窗台上有一只猫在看着她，忽然猫咪纵身一跃消失了。¹⁹李忆著在此处使用隐晦的符号来暗示了孙桂娘的心理，猫暗示她在婚姻前的自由状态，随着纵身一跃则表达了她逃避过去的情感纠葛。窗台上的猫在这个情境下是一个多义的符号，这种象征手法丰富了文本的层次，为读者提供了深度的思考空间。孙桂娘从小所受的教育观念，削弱了孙桂娘的自主性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使她更多地受制于传统社会观念和家族压力。尽管对苏春生产生好感，但“三从四德”的观念使她无法大

¹⁸ 李忆著，《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页 135。

¹⁹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47。

胆追求自己的感情，最终在社会期望和家庭责任之下，选择嫁给颜世昌。孙桂娘的自我主体意识受到了传统观念的限制，她缺乏对自身存在的深刻关注，更多地和社会规范和家庭责任中迷失，而非真正的个体选择。这样的情境也反映了女性在婚姻和感情方面的局限，她们可能在情感中感到矛盾，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往往选择安于现状，顺应社会的期望。因此，李忆著通过孙桂娘的经历呈现了当时女性在传统文化禁锢下，对自我主体性的困扰和无奈。

在颜世昌与红莲发生婚外情后，尽管孙桂娘内心煎熬和痛苦，但她仍然为了家庭试图挽回丈夫。直至她清楚意识到丈夫婚外情对自己和孩子造成的痛苦，才勇敢与丈夫断绝婚姻关系，离家出走。女性由于受到父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处于被动和次要的社会地位，使得女性在家庭内表现出较为保守的思想和行为，她们通常被强化为在家庭内负责照顾子女和家务的角色，因此也限制了她们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性。起初她经历了对家庭的忍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思想逐渐转向对家庭痛苦的清晰认识，开始反思婚姻的真正意义，最终的思想转变体现在她敢于面对婚姻的现实，并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这代表着她对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坚持，以及对幸福和自主的追求，从被动受害者转变为主动追求幸福和自主的个体。李忆著通过孙桂娘的经历展现女性在传统社会观念下的困境，对家庭的忍耐反映了女性在婚姻中被强调为顺从和忍耐的角色，同时呈现了她个体内心的复杂性和对自主追求的勇气，代表了女性对自己权利和尊严的坚持。《春秋流转》以女性为主要叙事者，第一人称分别以红莲和颜令冰以“我”的视角作为情节的交代，第三人称则是以颜令冰、赵静娴和孙桂娘为主要人物，描绘她们在小镇的故事。李忆著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直白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读者也随着视角的切换深入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

为阅读带来丰富的体验，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在不同章节的叙事达到了相互呼应，角色和情节的多面性逐渐完成塑造。

第二节 红莲：伦理的叛变

红莲在失去母亲后一直受到母亲阴影的笼罩，然而，颜世昌对她的关怀和爱意让她陷入了他的怀抱，逐渐形成一段不正常的关系。颜世昌向红莲投诉妻子的心肠，显露了男性情欲的渴求和伦理意识的松动。通过这种方式，他间接传达给红莲他对她的喜爱。在红莲频繁与颜令冰一起送饭给颜世昌的过程中，两人逐渐陷入欲望的陷阱，不顾伦理意识。红莲和颜世昌约会时，她虽然有些许伦理意识，清楚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并试图挣脱，但颜世昌一直用话语来诱导她，使她在欲望和伦理之间摇摆不定。红莲生活在父权思想的控制下，沿袭了母亲的命运，与颜世昌陷入了不正常的关系。孙桂娘将红莲视为女儿，当知道红莲和颜世昌的事情，她是怜悯的：“女人最要紧的就是名声，不能让人说闲话。流言蜚语是会害死一个女人的……世昌，你好无耻……”²⁰孙桂娘并没有责怪红莲，因为她将自己的经验投射在红莲身上，她了解被舆论包围和中伤的感受，也知道是颜世昌先透露心意，才成功诱导红莲。孙桂娘也经历过这一阶段，因此可以和红莲建立起女性认同，站在女性视角发现她们的困难处境都由男性操纵。李忆著通过这个女性角色突显了社会如何通过凝视和对女性的道德谴责来施加暴力，社会中的暴力更多以凝视和舆论来施加。个体在这种情境下很难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行动，最终成为暴力中的被动对象。相对男性来说，这

²⁰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05。

种舆论压力对女性来说是巨大的，她们很难逃脱社会舆论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因此受制于父权社会的道德框架。红莲的角色展示了丰富的情感层面，从失母的悲伤到对颜世昌的依赖，再到对伦理和道德的挣扎。她的情感复杂性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她作为个体的内心体验。

《春秋流转》的女性和男性角色几乎违背家庭和婚姻伦理，如同诅咒般的结局，两性都无法逃脱婚外情的宿命。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人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而组成人的斯芬克斯因子也有其不同组合和变化，才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性格，形成各异的伦理冲突。²¹人与兽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拥有伦理意识，对个体的行为和决策起指导和约束作用，包括对道德规范的认同，使人们能够在行为中考虑道德因素。婚外情是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的伦理冲突，文本人物的伦理选择和故事情节受到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复杂互动的影晌。²²婚外情的发生是由于人的欲望超越了道德法律和理性意志的自由意志，无法受理性压制的结果。颜世昌、红莲和其母亲、苏春生由一开始的欲望演变为对伦理的逾越，这是一种在非理性意志下做出的伦理选择，背叛了家庭和伴侣，他们的行为破坏了一个家庭。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不能对此行为作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要分析人物为何在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下选择发生婚外情。当人的伦理意识薄弱，就无法压制自身的欲望，组成人的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合成的，²³婚外情之所以发生便是兽性因子导致的非理性意志。由于非理性意志占上风，人便无法通过伦理规范对自身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约束自己。颜世昌和苏春生一开始是对伴侣

²¹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38。

²²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49。

²³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49。

的性格感到厌烦，他们都向红莲和孙桂娘投诉自己的伴侣，于是在其他女性角色的对比下，渴望从其他女性得到在自己和伴侣之中没有的感情，就越想要逃脱道德规范，因此自由意志已经超越了道德规范。起初红莲还是拥有理性意志，她并没有要违背伦理与他人发生不轨的恋情，此时表现的是理性意志。但在颜世昌的纠缠下，红莲开始心动，渴望尝试违背伦理的激情，从理性到非理性意志的转变，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春秋流转》的悲剧性结局源于个体对欲望的追求和在社会伦理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的。李忆著安排人物角色追随自己的欲望，却不能脱离伦理规范的束缚，于是只好惩罚违背伦理道德的人物角色，让他们走向死亡和家庭破碎的悲剧性结局。当文本人物的自由意志越膨胀，伦理意识和规范对他们的束缚就越薄弱，自由意志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矛盾冲突加剧了文本的悲剧性。解读文学作品需要从当时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去分析文学作品，²⁴《春秋流转》中人物生活在 1963 年的小镇，当时马来西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伦理环境是多元的。这一时期，社会受到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社会动荡和文化冲突导致人们在伦理观念上产生矛盾和困惑，因此在文本中反映个体在伦理选择上的困扰。《春秋流转》的伦理困境源自个体在自由意志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矛盾，文本中发生婚外情的人物，他们的道德伦理身份是丈夫、妻子和伴侣，伦理规范不允许他们背叛家庭。然而，他们并没有遵守自身的伦理身份，违背了家庭和婚姻的伦理规范。

²⁴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14。

第三节 小结

孙桂娘和红莲，两位女性角色在《春秋流转》中都面临了欲望与伦理意识之间的挣扎，然而，她们在这个挣扎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孙桂娘是传统社会下塑造的传统女性形象。她在男性的诱惑下产生强烈好奇心，却坚守着自己的伦理身份和家庭期望。在结婚后，她成为了传统妇女的典范，将工作和社交局限在家庭内，全心注重丈夫和孩子。她的性格透露出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悲哀，被道德规范束缚，要求女性隐忍、遵循戒律，以家庭为重。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孙桂娘的性格发生了转变，她勇敢地逃离了传统女性的限制，摆脱了男性的操纵，进入了一个没有男性思想的现代女性世界，却依旧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在她的心目中，教师是最斯文的职业，尤其适合女性……她一直如此认为：事业固然重要，但幸福的婚姻又比事业重要；一个女人若没有个温暖的家庭，实在也是算不上幸福。”²⁵尽管她希望女儿能够在婚姻之外拥有事业，但她仍然难以摆脱女性只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才算是完美人生的观念。

红莲则是对伦理的叛变者。由于母女伦理身份的缺失，她无法在母女经验中建构足够的女性意识和性别主体。她的主体意识较弱，虽然意识到自己违背了伦理规范，但却无法勇敢挣脱她最想逃离的男性。在男性的操纵、社会舆论以及对孙桂娘的愧疚和自责的困扰下，最终选择了投河自尽。颜世昌一直是这三位女性命运中的关键人物，他所造成的悲哀成为了她们生命中的阴影。颜令冰成年后也无法摆脱这一男性，成家后仍然怀念他，与红莲和解也是因为颜世昌的醒悟。这两位女性角色的经历呈现了对欲望和伦理规范的挑战，同时反映

²⁵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84。

了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男性的影响，她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中展现出了个体的独特性格和命运轨迹。

第三章 女性形象的建构：现代女性和母女形象

第一节 赵静娴：现代女性

《春秋流转》的赵静娴与其他女性角色不同，她十七岁就已成为益群咖啡店的掌柜，气势甚至胜过她父亲。她的性格强势、精明能干，在做生意这件事上很有一套计划，父亲过世后接手家族产业也没有退缩。“她十七岁就已大剌剌地坐在柜台收钱当掌柜的了。那架势俨然是老板娘的派头……准确地说，赵静娴才是益群咖啡店的老板娘。”²⁶赵静娴的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她代表着许多女性在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即想摆脱传统思想却又被束缚。她是对传统女性的反叛，反映了女性在面对传统观念和规范时的反抗与探索。她不满足于传统女性被赋予的角色，而是寻求自我认同。“他不止一次劝她把咖啡店的大权交移给弟弟。说毕竟赵作仁才是赵家的子嗣，才是真正姓赵地。”²⁷苏春生不止一次提及家族经营的咖啡店应该交由弟弟管理，毕竟赵静娴嫁人后便不姓赵了。自此，赵静娴的观念被苏春生影响，同意他的见解。然而，她最终未能真正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取得自由。赵静娴在与苏春生谈恋爱后，脾气变得越发古怪，她善妒、多疑，一旦苏春生与别的女人打招呼或者聊天便要发脾气，唾骂那些女人是骚货，咬他的手臂。赵静娴的性格虽和传统女性不同，她追求自由，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思想，她在感情生活中仍然是

²⁶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20。

²⁷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25。

生活的弱者，过于依附男性，这反映了女性在感情关系中的脆弱地位。即便女性选择了独立的生活，她们仍然倾向在生活中为男人和爱情保留一片空间，女性会在生活中分配最多的时间给予男人，而将职业仅限于最低程度的时间。²⁸赵静娴的命运受到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的交织影响，这也是作家通过这一角色试图传达的信息。

赵静娴将苏春生当作依赖，过多关注对方，没有将精力和时间都留在自身，失去了看待事情的判断。这种现象反映了她在自我认知和自我观察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传统的父权社会观念导致女性在感情层面上对于依赖关系的认同，将男性视为生活的支撑。女性一直都处于等待的过程，等待爱情、等待丈夫，这样的女性一直都认为男性是她生活的全部。²⁹赵静娴在两性关系上把握不好平衡点，没有给予苏春生该有的自尊，对方在赵静娴面前丧失了男性优越感。

《春秋流转》中提到，苏春生一开始是因为赵静娴的性格和自信产生兴趣，但随着自己的价值被对方瓦解便开始对赵静娴的强势感到厌倦，在孙桂娘温柔可人的对比下，男性该选择谁为伴侣便一目了然。苏春生和赵静娴缺乏良好的沟通，他默默忍受着赵静娴的脾气，对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矛盾得不到解决。双方后期的性格和悲哀结局都是基于两性沟通不良导致的，两性相处不和谐的原因是失去沟通和不对等关系的问题。

在传统的父权体制社会中，性别角色被严格划分为强弱，导致了不公平的两性伦理环境。在这种体制下，性别、家庭分工等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男女角色在社会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定位。女性通常被定义为家庭的主要负责者，

²⁸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344。

²⁹ 波伏娃，《第二性》，页555。

而男性则被期望成为家庭外的劳动者。³⁰这种观念不仅使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受限，也给男性带来了自尊和权力的过度关注，造成了焦虑感。当威胁到男性自尊的因素出现时，例如苏春生对威胁到他自尊的赵静娴感到厌烦，男性的自尊感和权力感在这种环境下变得尤为重要，而他们可能会寻求在其他女性身上寻找弥补。赵静娴在继承咖啡店生意的过程中，展现了女性在这一体制下的力量，这让弟弟赵作仁感受到失去权力的不安。然而，这种性别固定的观念不仅仅对女性造成了局限，也对男性造成了困扰。因此，文中的人物经历揭示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共同努力打破这种性别困境，以实现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社会一直以来将女性定义为家庭内的角色，她们更关注个人和情感，因此对待女性的身份是基于女性持家这种观点。³¹

第二节 母女：女性经验的投射

本节以《春秋流转》中的母女，即孙桂娘和颜令冰、红莲和母亲作为研究对象，剖析母女情感。母女关系中，母亲通常是文化价值、传统和知识的传递者。母亲会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孩子的利益与母亲是一体的，女孩的性别角色认同过程的延续，会形成一种原初认同。³²在父权社会下，母女容易产生女性认同，共同面对性别压迫和社会期望，促使她们成为女性共同体。孙桂娘的女性认同首先体现在她与赵红莲的亲密关系中，红莲自幼年丧母后需要母爱和

³⁰ 兰西·雀朵洛著，张君玫译，《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 243。

³¹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228-229。

³²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224。

关怀，她对红莲的疼爱和教导都透露出她试图弥补年轻时的遭遇。孙桂娘对红莲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怜悯和担忧，她认为女性的一生都受制于男性，因此传授经验给红莲，反映了女性身份的认同和担忧。然而，孙桂娘对红莲的怜悯和疼爱也受到反噬，家庭遭到破坏。但是，孙桂娘理解同为女性所面对的父权控制，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有深刻认识，当红莲与颜世昌发生婚外情时，她谴责的是颜世昌。

颜令冰是这么看待孙桂娘的：“家里留不住父亲是母亲一手造成的。老是一开口就冷嘲热讽的，别说父亲，就是连她这个做女儿的也觉得讨厌。”³³家庭发生剧变后，颜令冰重新审视父母，理解母亲为孩子和家庭所做的一切：“以前我怨恨母亲的喋喋不休，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她的心有多苦。”³⁴，令冰对母亲态度的变化，从最初的讨厌到后来的理解和接纳，这是建立起母女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的关键点。颜令冰之所以和孙桂娘达到女性认同，是红莲作为第三者插入她们的家庭时，两个女性角色共同面对困难而团结起来。孙桂娘带颜令冰和表姨妈居住后，她们建立起一个没有男性的空间，母女共同成为彼此的避风港，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李忆著通过描绘母女之间的互动，表达在没有男性庇护的情况下，女性能够逃离父权思想的控制，生活得更加自主和坚强，也展示了她们对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的认知，对母女共同体的向往。此外，李忆著对母女关系的探讨，强调了母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性之间的爱成为一种精神支持。

³³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30。

³⁴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64。

红莲的母亲在她幼年时与其他男性发生婚外情，最终因为无法摆脱因违背伦理造成的心理冲突和道德困境，选择了结束生命。红莲因此一直生活在被母亲笼罩的阴影之下：“镜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似曾相识。对了，就是母亲留在泛黄照相簿中的那个朦胧的影子。”³⁵红莲拿起母亲的裙子对着镜子端详，母亲的影子与红莲重合，这对红莲的婚外情埋下了伏笔。她抗拒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对母亲的存在几乎是与之割舍的态度。李忆著描写的这些情节，无论是红莲或她母亲，都是对自身发生了不轨的行为感到焦虑和恐惧，她们违背了父权社会制定的道德伦理。李忆著在《春秋流转》给女性角色安排的情节都是自己或伴侣发生了婚外情，她们选择放任自身的欲望，但结局又是悲惨的，这揭示出女性作家想逃离父权的威慑，渴望自主掌握爱情和生命。然而，由于社会的束缚和女性角色自身的迷失，这一渴望最终被摧毁，导致了不幸的结局。作者通过女性角色的命运，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异于传统期望的惩罚，也揭示了作者在文学中对母亲形象的表述所面临的内外矛盾。作者安排女性角色逃离父权压制，却在她们违反道德伦理时对其严惩，以悲剧性的结局结束她们的一生。作者意识到社会对母亲的不公，对于她们因违反伦理规范而受到的惩罚感到同情。李忆著既想反抗传统的伦理规范，却又不愿挑战父权制度所颁布的道德法则。由于对父权的恐惧或对传统道德的认同，在作品中仍然选择对这些母亲进行惩戒，表现出对父权的一种顺从。整体而言，这些情节反映出李忆著在《春秋流转》中对于家庭和父权关系的复杂认知，她在表达对母亲的同情和对父权的反抗时，也难以完全脱离传统的道德观念。

³⁵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64。

颜令冰在幼年见过父母婚姻的失败，没有将一切都托付于男性，她拥有作为独立个体的力量和勇敢，没有丧失女性的伦理身份，因此在丈夫发生婚外情后主动提出离婚，不拖泥带水，没有重蹈母亲的覆辙。颜令冰的命运和孙桂娘一样，都是丈夫背叛家庭，而女儿相对母亲更加成熟和稳重。然而，红莲母亲的死亡导致红莲母女没有建立起母女伦理身份，缺乏对红莲的性别主体建构的帮助。红莲执意摆脱母亲的阴影，她认为一个女人与别人私通是罪无可恕的，³⁶最想远离男性的她却与有妇之夫私通。母亲作为女儿建构自我认同和伦理身份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就如同一面镜子，通过反映母亲的经历，女儿在其中获得经验并建立自我认同。母女伦理身份的建立有助于女性认识到伦理困境，重新审视自我，反思女性的生存处境，进而帮助女性建立正确的性别伦理观和独立的女性伦理身份。

《春秋流转》的两性关系从父母一代的激烈冲突到孩子一代的缓和，李忆著追求两性关系的和谐。作者反思女性的生存困境，文本中蕴含的女性意识代表着作者希望女性能够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建立一个两性平等的环境。文本人物各有缺点，但没有简单地以善恶好坏的二元对立来划分，试图寻找两性关系的平衡点，反思女性的生存困境，理解男性的生存压力，塑造一个两性和谐的环境。李忆著试图唤起读者对于男女关系更深层次的思考，超越二元的伦理标准，理解背后文化与社会对于两性所施加的复杂影响。她的作品成为一个独特的镜子，反映着现实中男女之间的微妙互动，鼓励对于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审视和反思，促使社会朝着更平等与理解的方向发展。

³⁶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62。

第三节 小结

《春秋流转》的女性角色没能真正突破传统的限制，达到成为拥有女性意识的完整人格。在李忆著描绘的女性形象中，她们有各自的特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寻找出路，努力摆脱传统桎梏，往自主的方向前进。例如赵静娴，她和传统社会的女性不同的一点是，她在事业上有独特的主意，敢于接受父亲的咖啡店，不像传统女性被限制在家庭内的区域。相反的，她也有传统的另一面，将男性视为全部，不够独立自主。孙桂娘和颜令冰在经历家庭变化之后也逐渐拥有现代意识，不依赖男性，对束缚自身的事物作出反抗。李忆著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单一的善或恶，他们拥有多面性，情节的发展是有原因推动的，符合逻辑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一步步走向属于她们的结局。作者没有在人物的塑造上传达强烈的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而是展现在社会转型期中在传统和现代挣扎的女性，希望读者不要只看到女性传统的一面，也要注意女性进步的一面。在现实社会来说，这种女性在社会上存在的更多，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受到传统观念和父权思想的影响，女性被期望在家庭和社会上履行传统女性的角色；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受到现代意识的冲击，强调女性的独立和自主。传统和现代两种观念在他们内心产生冲突，女性尝试打破束缚，为自身寻求更好的出路。

第四章 结语

第一节 研究发现

女性角色的塑造呈现了对欲望和伦理规范的挑战，她们在不同的环境展现个体的独特性格和命运轨迹。尽管这些女性没有真正突破传统的限制，达到成为拥有女性意识的完整人格，但她们的经历反映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女性，寻求突破束缚，为自身寻求更好的出路。文本女性角色对自身的伦理身份了解不足，伦理身份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是决定个体在社会的道德发展。另一方面，女性角色对主体的建构除了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依赖同性关系，如母女、女性朋友等，在女性经验的传承和变迁中学习更多。《春秋流转》深刻地反映了男女角色在复杂的伦理环境中所面临的困境。李忆著并非简单地对男女行为进行伦理评判，而是通过两性情事的描写展现了两性之间的沟通困难和伦理差异，呈现了父权社会结构在两性关系中的深远影响。她的文学作品虽然多叙述两性感情，也反映出女性意识，鼓励女性建构独立的主体价值，但她对男性的描述并不激烈，反而是以温和的态度去述说男性的难处。从颜世昌和孙桂娘的经历可以发现，两人在生活和感情方面缺乏沟通，男性没有得到女性的谅解和温柔，长期的压抑才导致男性渴望从其他女性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感。作者在书写文本的过程透露出她对两性关系的反思，悲剧性结局的发生是因为两性在思想和沟通的差异，男女处于不和谐的两性伦理环境。父权社会的结构在不同层面对男性和女性都带来不同形式的压力和限制，男性在成长过

程受到所谓的男性规范的束缚，被困在社会期望的框架。颜世昌受到父权思想的影响，独自承受着家庭和工作压力，不允许自己向妻子展示柔弱的一面，导致心理压抑。对于婚外情的安排，作者更多是根据两性的处境和言行选择让两性角色违背伦理规范。因此，李忆著想透过描述两性情事传达出她的观点，家庭责任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建立和维持的，夫妻必须清楚自己的伦理身份和道德伦理规范，才能够明白自己应该做出什么行为。

婚外情作为一种道德悲剧，在社会中被广泛视为伦理问题，被认为是对家庭和婚姻伦理的严重侵犯，这种道德判断通常是明确而清晰的。³⁷然而，仅仅将婚外情描绘为一个简单的“善恶皆有报”的结局不足以捕捉《春秋流转》中所反映的深刻主题。该作品反映了个体对伦理规范的反抗，展现了在欲望和理智之间的调解与矛盾，当个体面临内在冲突，对于道德准则的质疑和对自身欲望的探索。这种呈现使得故事更为复杂和深刻，超越了简单的对错观念，而突显了人性对伦理规范和伦理身份的遵从和伦理选择的困境。李忆著通过对婚姻的反思，强调了两性关系在婚姻的关键性作用。她指出，传统观念中，女性在婚姻后往往被社会期望以孩子和家庭为中心，从而失去了婚前拥有个体自主生活的空间。这种过度注重家庭而忽略了丈夫的情感需求，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模式。婚姻应当是两个独立而完整生命的联合，而非将夫妻看作一个单位或封闭的细胞。强调个体在婚姻保持自由和独立性的重要性，只有在保持自主性的基础上，夫妻关系才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依恋的健康基础上，也能持续在社会上

³⁷ 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270。

独立发展。这样的观点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于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思考，强调了相互之间的平等和尊重的重要性。³⁸

《春秋流转》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的叙事手法，主题叙述者都是女性，一开始就以幼年的颜令冰为主要视角，来叙述她在小镇上的故事。这是一种儿童视角，主要从儿童的角度和经验出发，以直观的视角呈现故事。儿童视角的叙事通常突显了孩子对世界的独特感知和理解，以及他们对周围环境和事件的敏感度。《春秋流转》中，女性的声音被强化，作者放大女性的苦楚和处境，将她们的内在心理描绘出来。叙事视角的交替和女性声音也是李忆著在其他作品中惯用的文本叙事手法。关于父亲颜世昌在家庭内的性别角色，小说中呈现出一定的缺位。相对于母亲，颜世昌的角色在照顾孩子和家庭方面显得较为缺乏。他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对孩子的照顾和关注并不充分，这与传统的父亲角色有一定的偏差。母亲孙桂娘在颜令冰幼年生病时曾带她去寺庙求助，突显了母亲在家庭中的责任感和关怀。父亲的缺位可能反映了一些社会和文化中对于父母角色的传统观念，然而，小说可能通过这样的叙述手法在让读者反思性别角色在家庭中的分工和互动。这样的性别角色描绘可能旨在引发对于家庭结构和性别平等的思考，以及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反思。这种叙事手法有助于深化读者对于性别角色和家庭关系的理解，促使人们思考家庭中的责任和关爱应当是共同承担的。总体而言，《春秋流转》传达的观点聚焦于两性在婚姻和家庭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分工，以及个体在伦理规范和欲望上的失调。

³⁸ 波伏娃，《第二性》，页 439。

第二节 研究局限和建议

《春秋流转》在探讨两性关系时未明确表达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以及在反抗父权思想方面表现较为温和，注重刻画两性关系，这可视为文本的一种局限性。作者在叙述两性关系时，可以将父权制度下两性的冲突描写得更为激烈，增加文学的悲剧性。在研究文本时，由于难以过多使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可以转而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深入分析文本所展现的伦理问题。通过对两性关系的解构，可以更细致地揭示其中蕴含的道德困境，进一步突显人物内在冲突和社会伦理的复杂性。李忆著在文本中有多处隐晦的符号，在两性处于同一空间下会有第三者的介入，如颜世昌和孙桂娘在表白心意后的拥抱，孙桂娘看见一只猫从窗台跳下，随即失去了踪影。对文本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这些隐晦符号代表的意思，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和作者的安排。此外，在文本中也一直环绕着对外人对赵、颜两家情感纠葛的舆论，两家一直处于被议论的环境中，这也可以作为对叙事手法的分析。总体而言，通过更深入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结合对隐晦符号的解读和对叙事手法的分析，可以使研究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春秋流转》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和人物关系。

引用书目

专书

1. 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巴赫金，白春仁译，《诗学与访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 戴小华，《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6。
5. 付明端，《从伤痛到弥合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6. 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7. 兰西·雀朵洛著，张君玫译，《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
8. 李忆著，《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
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0. 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1.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12.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锐文创，2012。

期刊论文

1.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页50-52。
2. 马蜂，〈马华女作家的两性和谐小说探析〉，《中国女性文化》2017年第21期，页60-67。
3. 马蜂，〈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1-48。
4.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2015年第201期，页187-192。

学位论文

1. 林殷醇，《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论文，2020。
2. 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小说为个案》，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论文，2012。